

營造創科合作生態
促進香港產業升級



國際創科盛事「博鰲亞洲論壇國際科技與創新論壇2025年香港會議」今日起一連兩日在香港舉行，凸顯香港「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獨特優勢和角色，是香港傳統產業升級轉型的催化劑。會議分享國際創科發展經驗，探討「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應用，為業界提供重要參考。在全球創新激烈競爭中，香港傳統產業要更好拓展內需市場、進軍東盟等新興市場，推動產業高增值化發展。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強調傳統產業提質增值、改造升級，香港借力國家東風，促進產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傳統產業將實現新發展。

盧金榮 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

博鰲創科論壇首次落戶香港，是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里程碑，也是香港傳統產業探索升級轉型的重要平台。是次會議以「科技引領未來創新驅動轉型」為主題，與傳統產業以先進技術促發展、以創新手段求突破的大方向不謀而合。會議特設香港專場，探討香港如何發揮內聯外通優勢，拓展環球創科合作，有助業界更好掌握國際創科發展最新形勢，同時用好自身優勢擴展市場。十多場分論壇、前沿對話和圓桌會議涵蓋「人工智能+」、創新鏈產業鏈融合、可持續發展等業界關注議題，業界可藉此獲得啟發，並融會貫通至業務當中。

升級產業搶佔機遇

中共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加快建設製造強國，到2035年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近年不同產品市場競爭日益激烈，香港傳統產業企業在原有製造技術、生產模式、銷售手法以至宣傳手段等都需要全方位、全鏈條的升級轉型，從產品質素、技術含量、創新概念、創意設計等多方面佔領市場前沿。作為高水平的全球創科合作交流平台，博鰲創科論壇在港舉行，有利在工商業界中營造以創科促進步、迎商機的氛圍，推動香港傳統產業升級轉型。

世界經貿形勢近年發生重大變化，「東升西降」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西方發達國家作為產業技術创新的主導力量作用持續減弱，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產業鏈出現斷層，甚至發生產業「空心化」現象，與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亞洲的發展差距越收越窄，是香港以創科在市場突圍而出的契機。環球貿易重心東移，東盟等經濟體居民收入增加，當地消費者過去最為看重產品價格，如今對質量高、具特色的產品更加追捧，香港傳統產業要成功打入新興市場，升級轉型是必

由之路。博鰲創科論壇雲集逾800名海內外專家、學者及政經領袖，交流各地創科發展，分享成果轉化落地經驗，探討傳統產業如何應對新變化掌握新機遇，為香港業界提供寶貴參考借鑒。

抓住重點精準發力

香港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以創科成果賦能不同產業，既着力壯大新興產業、培養未來產業，也助力傳統產業升級轉型，循高增值方向在新時代中體現新價值。

香港傳統產業應更好對接國家新型工業化策略，抓住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三大重點，實現升級轉型：在高端化方面，用好香港高質高效專業服務機構，例如廠商會的香港品牌發展局、CMA檢定中心及展覽服務有限公司，做好品牌建立、檢測認證、科技商品化、技術升級、市場拓展等工作，提升產品價值和品牌形象；在智能化方面，加強利用人工智能技術，理順組裝、包裝、質量檢查等環節，提升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在綠色化方面，引入最新節能技術，實現生產資源循環再用，設計生產迎合消費市場環保風氣的綠色產品，在降低成本的同時承擔企業社會責任。

環顧世界，主要經濟體近年推動工業再發展的一項普遍做法是由政府牽頭制定產業發展的戰略和規劃。去年施政報告已提出為香港新型工業發展研究制定中長期方案。面向環球創科發展新形勢，需要更大力度支援廠商轉型升級。現有的「新型工業化資助計劃」，除資助廠商在香港設立全新智能生產線外，亦應為企業改良現有生產設施裝備、擴充高增值業務、探索创新的經營模式、優化生產流程和管理手段等提供支持，以企業優化為目標推動企業發揮創科主力軍作用。

國際調解院彰顯中國智慧與擔當

吳英鵬 中華司法研究會理事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爭端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從貿易摩擦到領土爭議，從網絡安全到氣候變化，全球治理面臨諸多挑戰。然而，現行國際爭端解決體系卻存在明顯的制度供給不公和不足問題。在這一背景下，中國牽頭與多國籌建的國際調解院在香港落戶，不僅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了全新平台，更彰顯了中國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智慧與擔當。這一重大舉措，既是對國際社會迫切需求的積極回應，也是中國傳統文化智慧與現代國際法治理念的完美結合。

推行公平创新的爭端解決機制

當前國際法律體系中的爭端解決機制面臨嚴峻挑戰，特別是受到長期奉行單邊主義的美國的破壞。例如在2025年2月，美國政府宣布將對國際刑事法院官員實施「切實而嚴厲」的制裁，粗暴干預國際刑事法院的運作；自2019年12月至今，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因美國數十次單方面阻撓遴選新法官而陷入癱瘓，導致大量國際貿易爭端積壓無法處理；在2016年，美西方與菲律賓組建因案而設、案終而散的臨時仲裁班子，炮製了所謂的「南海仲裁案」，並通過西方媒體誤導國際社會為「聯合國背景的仲裁庭作出裁決」。這些事件暴露出當前國際爭端解決法律機制存在的諸多問題與漏洞，亟需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新制度加以完善。

除了政治原因，在爭議解決的技術層面，無論訴訟還是仲裁，都是對抗性激烈且成本高昂的爭議解決途徑，不利於國際爭端的和平解決。相較之下，調解（調停）作為《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優先方法，擁有友好、靈活、便捷和高效等優勢。國際調解院作為首個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恰逢其時地填補了這一制度空白，也是對《聯合國憲章》所倡導的和平解決爭端原則的具體落實，豐富了聯合國框架下的爭端解決工具箱。同時，國際調解院的設立也充分回應了世界多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對更加公平、高效的爭端解決機制的迫切需求，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秩序提供了制度保障。

國際調解院帶來的制度創新意義，不僅在於技術層面的改進，更在於理念層面的突破。國際調解院的成立和運作秉持「和解合作和諧」、「公平公正公道」、「共商共建共享」等理念，每個成員國無論大小強弱都可以自願參與、平等決策、共同受益。這種新型的治理模式與美西方國家奉行的「俱樂部式」單邊主義形成鮮明對比，代表了以公平正義為理念的全球治理體系改革方向。

善用中華文化根基與香港制度優勢

國際調解院在香港設總部絕非偶然。首先，國際調解院的制度設計深植於中華文明的「和合」治理智慧。從孔子

的「君子和而不同」到墨子的「兼愛非攻」，「和為貴」的協商性糾紛解決理念貫穿中國法律文明史。調解文化基因在當代中國社會治理中更是得到了創造性轉化，大量的社會糾紛通過多種調解機制得到化解，有效地維持中國社會的和諧穩定，為中國的高速發展創造有利環境。第二，香港作為國際調解院總部所在地，充分展現了「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例如，香港法律體系既保留了普通法傳統，又能通過區際司法協助與內地法律秩序銜接，相當大一部分香港律師具有處理跨境爭議的經驗。特別是近年大灣區法律服務業的融合發展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優勢，「大灣區律師」資格考試制度實施以來，已有數百名港澳律師獲得內地律師執業資格。這部分港澳律師既精通普通法環境的規則，又了解內地司法實踐，能夠在跨境調解中發揮獨特作用。此外，國際調解院在香港設立也為香港法律界帶來重大發展機遇，將鞏固香港作為亞太區國際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地位，也為「一國兩制」實踐注入新的活力。

大國擔當與全球治理的新實踐

國際調解院的設立是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里程碑式實踐。與美國奉行單邊主義、頻繁「退群」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堅定維護踐行多邊主義，已經加入幾乎所有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和超過600項國際公約及修正案，是聯合國第二大會費國和維和行動主要參與國，積極踐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中國牽頭成立國際調解院也是中國維護踐行多邊主義、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和法治化、倡導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紛止爭的重要體現。實踐證明，中國踐行多邊主義理念正在獲得越來越多國家的認可，國際調解院創始成員國一開始已達33個，涵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歐洲等，相信未來國際調解院的成員國規模會進一步擴大，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主體樂意把爭議提交國際調解院進行調解。

我們還需要看到，中國牽頭設立國際調解院的深遠影響將超越爭端解決本身。從制度層面看，它開創了發展中國家主導國際規則制定的先例，完善國際規則體系，打破了西方在國際法領域的話語壟斷。從文化層面看，國際調解院推動了中國傳統「和合」文化的現代化表達，為全球治理提供了東方智慧。從實踐層面看，國際調解院探索了跨境爭議解決的新模式，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了制度支點。以建立國際調解院為序幕，中國和眾創始成員國將不懈努力共同推動國際爭端解決機制朝着更加友善、公平、合理、高效的方向發展。

歷史將證明，國際調解院的成立不僅是一次制度創新，更是一種文明對話，彰顯了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的歷史自覺——不是要取代現有國際秩序，而是推動其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改革。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時代，這種以對話代替對抗、以共贏取代零和的治理智慧，正是國際社會最需要的公共產品。

引領高校進駐北都區
吸納人才倚港興業

陳月明 立法會議員 打鼓嶺鄉事委員會主席



美國國土安全部早前宣布，取消哈佛大學獲得的學生和交流學者項目資質，禁止該校招收國際學生，至美國時間4日美國總統特朗普更簽署公告，暫停持有簽證的哈佛大學新生入境，還指示國務院考慮撤銷符合公告標準的哈佛在校生生有的簽證。香港正全力推進成為國際專上教育樞紐，特區政府與高等教育界可把握機遇，加強向世界推廣「留學香港」品牌，並加快「北都大學教育城」建設，吸引受影響學者、學生轉至香港，倚港興業。

強化香港國際教育樞紐角色

筆者一直倡議擴大發展北都大學教育城，並多次向特區政府建議，擴大打鼓嶺區內的大學城規劃用地面積，建設更大校區，加快建设步伐。筆者也建議特區政府把握機遇，吸收在哈佛事件中受影響的各類國際人才，並加強與內地知名高校聯合辦學，強化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角色。

5月29日，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上強調，香港是一個擁有良好教育系統和良好教育質素的地方，擁有5所世界百強大學，而且不少課程是世界排名第一或位列全球前5名或前10名之內，極具吸引力，具有顯著優勢。李家超亦強調，將會好好把握機遇，發展香港成為國際高等教育樞紐。除了繼續審視收生限額，確保本地大學可吸納更多在美國受到不公平對待的學生之外，又會加快北都大學教育城的建設。李家超兩次指出，和深圳接壤的打鼓嶺坪峯有更大的發展空間，擴容機會更大，可在教育、青年工作、科技、創新研發上，起到協同發展作用。

北都區是一塊尚未完全開發、有着無限可能的寶地。特區政府未來須向內地及國際

頂尖學府、科研機構提供土地及其他支援，吸引他們到北都區開設分校，或與香港本地院校聯合辦學，包括合辦學院、學科、項目等，藉此建立高質素、國際化的高等教育和科研體系。

特區政府現在已有充足的政策空間，為這一地區度身訂造一套全新的體制、機制，讓北都區成為「特區中的特區」，創建出一套能夠適應創新科技發展的新模式、新機制，以全新思維，建立一套全新的發展建設、招商引資模式。這項建議同樣適用於推進北都大學教育城建設。特區政府可積極考慮為北都大學教育城制定一套有利於學術發展、科學研究，以及人員交流的制度，便利更多海外、內地頂尖學府和人才落戶北都區，扎根北都區，發展他們的事業，同時也為香港建設國際教育樞紐作出貢獻。

對接內地科研產業鏈

北都區另一項獨有的優勢，在於毗鄰深圳，擁有七個連接深圳的陸路口岸，便於對接大灣區內地城市的創新科技產業鏈，以及廣闊的內地市場。北都大學教育城應用好這一位置優勢，建立起緊密的大灣區產學研合作機制，讓北都大學教育城成為大灣區創新科技產業的教學基地、研發基地、人才培育基地，以及初創企業和創新產品的孵化基地，以此吸引更多國內外學府、科技機構和人才，到這片土地尋找機遇。

李家超已明確表達，加快及擴大北都大學教育城建設的意願。期望特區政府各部門能夠進一步打開思路，破革新求，發揮好北都區的優勢，更好引領社會各界和資本市場集中資源、發揮創意，加快北都區大學教育城的建設，以廣納人才，共築香港輝煌。



賴清德當局製造「寒蟬效應」
破壞兩岸交流

鍾安平

台灣地區領導人賴清德上任一年多來，處心積慮打壓兩岸交流，頻繁製造「綠色恐怖」，令島內民眾人心惶惶。最近，賴清德當局又將打擊目標對準媒體界，威脅查處參與「海峽兩岸中華文化峰會」的旺旺中時集團（簡稱旺中集團）。賴清德及民進黨當局不斷擴大在島內的政治打擊範圍，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勢。從長遠來看，這是令台灣元氣大傷的內耗，並將進一步對台海局勢造成惡劣影響。

以民主為名 謀一黨之私

事實上，抑制兩岸交流既是賴清德當局的目標，也是其打擊政治對手的手段。誠如旺中集團旗下的台灣《中國時報》社論所述，兩岸同屬一中的法理事實不容否認，賴清德當局此舉係「恣意羅織罪名」。通過施壓支持兩岸交流的團體、封殺統派和親大陸人士的言論，賴清德當局一心在島內製造「寒蟬效應」，已然與其標榜的「自由民主」背道而馳。

為逞一黨之私，賴清德當局以所謂「安全」之名，將正常的兩岸交流、學術往來、民間接觸都納入所謂「反滲透」範疇，造成台灣社會活力的削弱，令越來越多的民眾倍感壓抑。《經濟學人》文章直言，賴清德以「反滲透」名義對內壓制反而加劇社會對立，造成台灣當前政治失能，整體實力流失。

自詡為「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已在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近日，賴清

德當局行政機構篡改關於台灣人口組成的表述，將佔比逾九成五的「漢人」變成所謂「其餘人口」。這種自斷歷史文化根脈的行為，將對台灣造成重創，勢必加劇台灣社會的撕裂。近期島內民調顯示，有近八成的受訪民眾對賴清德施政感到不滿意。可見，賴清德當局對內政門、對兩岸交流封鎖的肆意行徑，已觸怒民意。

言行不類 激化對立

賴清德執政以來，對兩岸關係的破壞是肉眼可見的。賴清德在「5·20」就職周年前夕接受日媒專訪時曾表示，希望與對岸展開交流與合作，把對抗轉為對話、封鎖轉為交流。然而，對比其所作所為，其言行不一的分裂感暴露無遺。無論是拒不解除赴大陸旅遊的「禁團令」、持續對大陸有關團體和人員赴台參訪交流設卡設限，還是清查台灣民眾領用大陸證件、明確島內藝人言行查處範圍、強制驅離陸配等荒誕之舉，賴清德當局都在不斷激化兩岸對立態勢，將台海推向危機與衝突的險境。

近一年來，儘管面臨重重阻礙，台灣各界依然在努力爭取「登陸」交流。所謂「反者道之動」，賴清德當局針對兩岸交流「關門設障」的種種倒行逆施之舉，只會令更多島內有識之士拿出實際行動，證明兩岸交流的大勢不會被隔斷。希望賴清德當局正視島內盼望兩岸交流的民意，停止打壓兩岸交流，否則台灣將在持續內耗中失去原本珍貴的活力。